

论现代文学史上中共党员作家群的创作特征

罗伟文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现代文学史上的中共党员作家群是建构现代左翼文学和红色文化的中坚力量,但学界对其创作却缺乏深入的研究。要合理评估中共党员作家群开创新创作模式的贡献,需对这一群体的创作特征进行横断面的深入剖析。中共党员作家群创作特征体现在3个方面:构成了以革命启蒙为精神内核的启蒙书写;形塑了一种带有鲜明党派特征的新型文学;蕴藏着以人民性为内核的时代特征。对中共党员作家群创作特征的研究能还原其创作的本真面貌和深化对这个群体的学理认识。

〔关键词〕中共党员作家群;创作特征;革命启蒙;党派性;人民性

〔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2023)03-0048-08

现代文学史上的中共党员作家群是建构现代左翼文学和红色文化的中坚力量,他们以澎湃的政治激情和前卫的艺术探索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模式。但国内学界对这股中坚力量的创作却缺乏深入的研究,诸多研究者只是笼统地把它归于左翼文学名下泛泛而论。这种研究策略模糊了党员作家群与非党员左翼作家的区别,使我们无法合理地评估这个群体的创作特征及他们对现代新文学所做的贡献。为弥补学界在这一研究向度的欠缺,笔者拟对现代文学史上中共党员作家群的创作特征进行横断面的深入剖析,以期能还原这个群体创作的本真面貌和深化对这个群体的学理认识。

一、构成了以革命启蒙为精神内核的启蒙书写

作为奋斗在中共文化战线上的主力军,中共

党员作家用手中的如椽之笔自觉致力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启蒙”。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党员作家都紧跟党的前进步伐,认真领悟和积极宣传党的革命理念,用生动的文学形象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启蒙^①。因此,革命启蒙的书写构成了党员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核。

中共以独立的政治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后,就坚定地推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实现“人类彻底的解放”。1922年7月,中共发布《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称共产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明确提出了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想。在崇尚革命的时代氛围下,敏锐的党员知识分子顺应时代要求重新定义文学,促使文学由五四的“浅薄启蒙”向新时代的“伟大启蒙”转型(成仿吾语)。邓中夏就从政治功利的角度界定文学的功能,认为文学作为激动感情的

〔收稿日期〕2022-03-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DJ054)

〔作者简介〕罗伟文(1968—),男,江西临川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①启蒙是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驱动力。现代文学史上回响着几种启蒙声音,革命文学是以精英意识审视工农的大众启蒙书写,在革命的表层叙事下涌动的是知识者的个性追求,此时不存在左翼叙事;1930年代形成了党的左翼和鲁迅左翼两种传统,前者是以政治理性对无产阶级进行诠释的革命启蒙书写,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被赋予崇高的价值意义,后者仍坚持大众启蒙,劳苦大众被塑造成有待拯救的弱势群体;延安时期则是由党的政权对工农大众实行全面解放的普遍启蒙,工农兵被塑造为时代所需的新人。党的左翼和延安文学的目标是革命启蒙,内含着阶级斗争的价值叙事,鲁迅左翼虽认同无产阶级革命,却是一种人道叙事。两者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隙,成了困扰诸多党员作家的理论难题。

工具能“唤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1]。鼓吹革命文学的价值成了诸多党员作家的理论自觉。郭沫若认为，文学随时代而变，今日的革命文艺应写出“被压迫者的呼号”和“革命预期”^[2]。因此，文学书写革命是符合时代变革需要的，它应承担起用革命观念启蒙民众和促进民族解放的时代任务。左联时期的理论家将推动无产阶级文学作为自己的终极使命，呼吁那些追求革命成功的作家，在文学上要时刻“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3]，并规定文学要反映“资产阶级”和“新兴阶级”这对立两极的生活。周扬将纲领中的原则加以极致化的推演，强调作家要“彻底地贯彻自己的阶级性、党派性”，才能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无产阶级文学。阳翰笙则指出作家参加大众斗争的重要性，认为这样才能写出具有充实感的“战斗生活”。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则以政策规约的方式强调了文艺的使命，要求作家主动承担党所“规定的革命任务”。革命的作家应该开展新的启蒙运动，提高民众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总之，在中共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员作家都肩负着用文艺推动革命启蒙和对敌斗争的任务。

在创作上，党员作家的主题表达凝聚了高度的共识：书写革命。革命文学^①时期党员作家热衷采用革命加恋爱的双重叙事模式，却没有形成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而是在恋爱叙事背后传达了单一的主题：爱情与革命一体。洪灵菲借笔下人物霍之远的几句话对这一主题作了通俗注解。“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谐和，两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4]。洪灵菲《流亡》中塑造的革命者沈之菲，痛感旧的制度弄坏了“恋爱和吃饭两件大事”，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解除生的苦闷。作为革命者，他追求革命；作为正常男人，他渴慕爱情。在沈之菲心

中，恋爱与革命具有同一种属性，“都是生命之火的燃烧材料”。左联时期，革命叙事的主角虽然从知识精英置换为农民大众，但书写的主题是农民通过暴力反抗融入革命洪流。叶紫的《丰收》贴近地描写了农民“革命的实际”。小说在父子冲突的表层叙事下，隐含了农民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下由觉醒到反抗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借新旧两代农民在改变自身命运方式上达成的共识，形象地回答了以革命斗争谋求解放的时代难题，展示了农民革命在党的领导下走向自觉的趋势。至延安时期，认同和书写革命成了作家必须履行的神圣使命，文艺自觉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成功地将革命理念植入整个文本叙事，小说以贫雇农（革命者）和地主（反革命者）的二元对立为叙述框架，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登上“革命政治舞台”的勃勃英姿，具有教育和帮助人民对敌斗争的启蒙意义。可以说，延安时期中共党员作家的革命叙事展现了新生代农民惊天动地的革命生活和伟大变革。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语）。从中国现代历史演进的情形看，革命的确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伦理的正义性。但革命究竟如何进行？中共做出的选择是：用暴烈的阶级行动。而通过区分敌友的阶级分析方法寻找中国革命的同盟军，这是中共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作为敏锐感应时代风气的先行者，中共党员作家以深沉的使命感对中国革命的这个根本问题做出了思考，他们用想象的言说传达了一个共同的理念：革命是建立大同社会的途径。党员作家形构了一种以阶级革命为内核的启蒙书写，这一书写有自己崭新的内涵，理应看成是“别一种意义上的启蒙”^[5]。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中共顺应历史情势制定了不同的革命纲领，使得党员作家在不同时期对启蒙内涵的理解表现出不同。革命文学时期，党员作家思考的启蒙是将普通工农解放出

① 程凯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内质有一中肯界定，他在《寻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一文中认为，革命文学是指“20世纪20年代以鼓动革命为目的的文学”；左翼文学是指“三十年代以对抗资产阶级政权、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或其它革命理念为特征的文学”。前者酝酿于20年代初，兴盛于20年代末，用文学鼓动国共认同的国民革命；后者致力于想象和塑造无产阶级革命，并在30年代形成了党的左翼和鲁迅左翼两大传统。党的左翼才是形构延安文学的基础。参见：程凯. 寻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75-77.

来交给无产阶级革命。左联时期,党员作家主张的启蒙是唤醒底层民众的革命潜能去夺取政权并建设理想社会。延安时期党员作家理解的启蒙则是一种“普遍的启蒙”,它经由知识与工农间的双向互动促进工农兵投身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从而建立人民的共和国。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像学界通行理解的那样,将这种革命启蒙书写笼统地归之于左翼文学名下,而应该区分出党员作家创作的精神内质。鉴于文学与中共革命实践之间的复杂互动,这一内质的生成有一个演进过程。革命文学时期中共虽以辅助身份参与国民革命,但此时的党员作家已具备了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思考文学的能力,如邓中夏发表的《新诗人的棒喝》热切呼吁作家投身工农运动并用文学表现工农运动的洪流。当然,此时党员作家的革命书写经常陷在情爱的叙事中,党员作家的身份标识并不凸显,他们以自由身份想象革命,在革命话语中回荡着个性解放的声音。左联之后中共加强了对作家的组织管理和观念教化,形塑了一种以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为特质的党的左翼,党对文学有了明确的理论要求。由此形成了钱理群所说的两个左翼传统,一是鲁迅左翼,一是党的左翼,这两个左翼在1930年代之后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和本质区别^[6]。从都支持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来说,它们之间有内在一致性,但其精神内质却有根本区别。党的左翼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根基,内蕴着用社会革命方式去实现被压迫者解放的信仰;左翼作家的认知图式则属于五四启蒙传统,主张用文化革命的方式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前者的代表是周扬,他站在政党高度去建设左翼文学,强调作家要拥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后者的代表是鲁迅,他从新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左翼文学,认为作家应投身于对“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由于两者采纳的思想资源不同,其叙事逻辑也形成各自的特征。党员作家的革命启蒙采取激进姿态,相信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形塑了一种“觉醒—斗争”的社会改造叙事。而鲁迅左翼的文化启蒙则运用柔和的姿态,主张通过超越具体政治理念的渐进改良来改变世界,形塑了一种“启蒙—觉醒”的文化批判叙事。延安时期则完

全由党的政权从组织和观念上指导文艺,发展出党的利益至上的艺术观念,鲁迅左翼退隐,形成了重政治性和党派性的工农兵文学。从此,中共党员作家的创作身份得到明确标识,他们所书写的与党所宣传的必须保持一致。可以说,中共党员作家布道的新信仰、新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启蒙,是顺应中国社会情势而开拓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派左翼。

二、形塑了一种秉有鲜明党派特征的新型文学

左联成立之后,中共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党在文艺领域的领导。由于思想上的引导和组织上的约束,作家的党员身份获得了特殊的政治含义,其创作和活动被纳入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轨道。作为活跃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创作群体,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使他们具有了不同于左翼作家的党派性特征。强烈的信仰追求和严格的组织纪律陶染和塑造了党员作家自身的品性,正是这种品性形塑了一种秉有鲜明党派特征的新型文学。

党派性是一个政党的固有本性,是政党之间能够彼此区别的标志性特征。许纪霖曾敏锐地指出,与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相比,中共的党派性特征集中体现在信仰力和组织力两个方面。他认为,就信仰力而言,马克思主义在“科学和信仰”的双重层面为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知识上和情感上的认同。前者以马克思主义的一整套学说“满足了知性型知识分子认知世界的需求”,后者以共产主义的超越理想“为情感型知识分子”提供了心灵信仰。就组织力而言,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组织为那些处于散沙状态的苦闷青年“提供了一个有团契生活的‘家’,一个得以精神依赖和人生庇护的组织”^[7]。正是信仰力和组织力的双重合力,塑造了这个政党的鲜明个性,并驱使党员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发生蜕变。本来那些受五四新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激进知识分子,养成的是重个性、尚浪漫和自由的精神气质,而一旦成了党的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重集体、崇现实和纪律就是他们重塑自我的必然选择。因为对每个党员来说,

“站在党性”的立场来思考是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这种自我精神气质的重塑使党员作家能够自觉以党性的立场观察、表现生活，从而为党派文学的开创准备了思想资源和主体条件。

因而，我们可以从信仰力和组织力两个方面来解读党员作家形塑的党派文学特征。

从信仰力方面来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一种内在力量造就了党员作家共同的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观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这一理想铭刻为终极奋斗目标，它被擘画为一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蓝图。1921年11月为接纳党员而定制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是“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即“创造共产主义社会”^{[8]548-550}。20世纪30年代左联则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根基，致力于宣传和建构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左联的行动纲领和宣言都宣称要实现“新兴阶级的解放”，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左联积极鼓动党员作家响应中共的政治主张，在文学实践中形塑一种具有党派特征的文学。40年代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党员作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奋斗。《讲话》以政党决议的方式规定了党员作家承担的历史使命，凸显了文艺创作的党派性要求。在这种规约之下，党员作家需主动改造自己以符合党的期望。丁玲经过自我调适，宣称共产党员作家只有持守“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9]。何其芳表示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10]。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召唤并建构了新主体，使作家的价值观和精神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种以党性为灵魂的新型文学得以成熟。它在创作上集中体现为党员作家以文学为武器服务于党的革命事业。秉持这样的信念，党员作家在作品主题的表达上表现出共同的政治意识。如左联时期，党员作家热衷于真诚地表现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为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鼓与呼。茅盾的《残冬》以写实的笔致反映了旧中国新一代农民的觉醒和农村武装革命的历史趋势，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延安后期的党员作家则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解放事业为主

题，表现和歌颂工农兵的伟大革命精神。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土改斗争，歌颂人民建立自由新中国的辉煌历程，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党员作家同声合奏的这场信仰叙事，为现代文学贡献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从组织力方面来看，中共严密的组织纪律以一种外在规约重塑了党员作家的精神气质。与主义有着内在关联的组织并不是自由职业者自愿结成的行业共同体，而是遵循一定原则进行严格管理的政党组织。中共最早颁布的党章中就专列“纪律”一章，旗帜鲜明地规定了党组织与学术团体的界限，要求共产党员必须绝对执行党的决议和服从党的纪律约束。在中共历史上，重视组织纪律的建设一直都是党建的重要内容。1941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11]前者属于主义信仰，后者则是组织纪律，它们是保障革命成功的两大法宝。重视组织纪律会本能地拒斥带有个人意识的自由生活，而要求成员参与一种具有集体色彩的团契生活。参与组织意味着与革命同志一道从事一项集体事业，这种约束力量使所有参与者从根本上改变重自我、个性的精神气质，重新养成一种重集体、党性的气质。因为对于党员作家来说，他的灵魂“不属个性，他只能服膺党，服膺革命的神圣事业”^[12]。这一精神气质的重塑给党员作家的创作带来了重要影响。组织的规约力量使党员作家放弃崇尚的文人式个性化写作，自觉按照党的意志进行集体化的同声合唱，做一个合格而有用的文艺战士。丁玲曾自述投入党的怀抱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表示主动改造自己身上的“名士气派”，不再做“自由人”和“同路人作家”，决心接受“党的铁的纪律约束”，成为“共产主义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13]。她将这一过程形象地称为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接受紧箍咒的固定，其实质是个性服从党性。1944年6月丁玲创作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可说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一个成果，她以政治上的高度认同描写边区“新的人物和事实”，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党员形象。田宝霖“一切替老百姓想”的办事风格隐含了边区新的官民关系，彰显了一种执政为民的全新管理理

念。毛泽东在读了《田保霖》之后,欣喜地称许该作展现了“新的写作作风”。按照丁玲后来的解释,这一“新的作风”表现在:到工农兵中间去,“改造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兴趣”^[14]。它的灵魂就在于服从党的神圣事业需要,真诚地完成自我改造才能写出精品佳作。在组织规约的强力引领下,诸多党员作家深入民间进行主动改造,消解创作主体的个性精神,将自己塑造成被党的意识形态所认可的集体意志,写出了一批体现解放区文学新方向的优秀作品。当然,也要警惕刚性的组织规约对作家创作个性造成的不适甚至伤害。

党派性是形构党员作家内在精神的思想之魂,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革命文学时期,党员作家表现出对主义的信仰但没有组织的规约,其创作彰显的党派特征并不明显,在精神上仍保持着与五四启蒙文学的联系。左联时期,由于主义信仰和组织规约的合力塑造,党员作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达和艺术追求上都烙上了明显的党派色彩。延安时期,《讲话》思想的强力打造使一种秉有人民性内核的党派文学最终成熟。文学党派性的成熟具有双重意义,从表层意义来看它意味着文学与党的革命规划之间建立了有效关联,从深层意义来看它表明借助文学想象在党和人民之间确立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是因为敏锐捕捉到党派性的深层内涵,周扬在1932年就将党派性高扬为党的文学的旗帜,是达到自由的“唯一之路”。

可见,文学党派性的规约力与鲁迅左翼秉持的自由性之间存在冲突,由此形成了革命与文学、党性与个性、服从与自由等二元性矛盾。对于前者而言,自觉接受党的意识形态指引和塑造是保持作家身份的必然选择,因此遵循党派革命纲领去观察社会、想象革命使党员作家的创作带有鲜明的党派特征。如洪灵菲、丁玲、周立波等党员作家都是在党设定的革命蓝图下书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其思想里配置的是当时党为革命制定的纲领和规划,是从革命层面来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对于后者而言,坚持个性和自由才是确保作家身份的前提,因此用自我的方式观察社会、解读革命才能有效地赋予作品政治内涵。如萧红、萧军等左翼作家在书写工农生活时,其思

想里装置的却是人道主义和启蒙观念。而对于那些投身革命并以“文学为志业”的党员作家来说,用文学叙事的方式参与党的革命事业是他们神圣的使命。如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所说,自己搞文学是因为可以用它反映我们革命队伍里“一切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15]。这正是党赋予党员作家的核心任务,毛泽东称之为“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实现民族的解放^{[16]847}。这里对党员作家与革命运动之间关系的界定,隐含着对革命自身所需的政治主体的确认,以此达成创作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同一。通过这种同一,党员作家就能克服上述二元矛盾并蜕变成为信仰而生活的革命战士,并按照党的左翼要求塑造出符合政党需要的文学形态。当然,如何应对上述矛盾的挑战考验着每一个党员作家的智慧,由于党员作家文学志趣、流派资源和生命体验的差异,使这一群体内部产生出多样的文学景观。如左联时期的蒋光慈重视苏俄文化中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关注,在创作中演绎了革命叙事和个人叙事的二重变奏。丁玲吸纳鲁迅的启蒙精神,重视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丰富了革命启蒙的思想深度。茅盾则表现出党派性对他的深刻影响,《子夜》的构思和主题完全符合党对文学的规范。延安时期的党员作家为应对政治规约探索了3种写作方式:周立波式的顺应,《暴风骤雨》就是自觉运用《讲话》精神图解党的政策的作品;丁玲式的调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既有遵命式的书写又有独立的思考;王实味式的抵制,《野百合花》以独立的批判态度坚持国民灵魂的改造。党员作家创作的这些复杂面相构成了文学史上丰富的精神景观。

三、蕴含着以人民性为内核的时代特征

“扎根人民”进行艺术创作是中共党员作家群展现的又一显著特征,它是中共倡导的为人民服务这一政党宗旨在文艺上的反映。中共党员作家精心地将“文艺为人民”嵌进自己的话语实践,形象地演绎了“党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的思想,蕴藏着一种以人民性为内核的新的时代特征,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学观念发展的重大理

论创新。

文艺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指“作家与人民的关系及作品思想评价的普遍性的尺度”^[17]。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历史性范畴，其涵义因历代理论家的阐发而逐渐丰富。马克思关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8]这一论断中，已蕴含丰富的人民性思想。他将这一洞察运用到文艺问题的思考中，强调文艺也要表现人民的精神和历史地位。马克思批评拉萨尔的《济金根》在表现国民统一问题时，完全没有意识到“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潜藏的积极革命力量。列宁在继承马克思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19]的思想，阐述了群众掌握文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拓展和深化了文艺人民性的内涵。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并结合中国左翼文学发展的经验，在《讲话》中创新性阐述了人民本位的文学观。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16]863}“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应“是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16]864}文艺要联系群众的深层原因在于，艺术家使用的“原始材料”深藏于人民生活中。艺术家若不深入到人民中去研究这些材料，就会堕落为空头文学家。毛泽东还赋予了文学巨大的现实功能，认为艺术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建构民族国家的力量。应该说，文艺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它的理论旨趣是作家站在人民的立场呈现和想象人民的生活和力量。

遵循中共关于文艺人民性的理论构想，党员作家以丰富的文学实践形构了一种秉有人民性的新文学。

1. 描写历史的真正主人。发现工农身上蕴藏的革命力量是中共令人叹服的政党智慧，中共建党不久就将革命的动力定位于工人和农民。在其后的革命实践中，中共重要领导人都强调工农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革命的成功要依靠由4种人组成的广大人民群众，其中，农民属于“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党员作家深刻地领会了中共关于中国革命动力的认识，在文学中叙述和想象了一个以工农为革命主体的现

代性叙事，展现了一幅新的人物画面和生活场景。左联时期的党员作家创作了一些反映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作品，如洪灵菲的《大海》描写了觉醒后的农民改天换地的革命斗争，那些“穷透的人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轰轰烈烈的农会运动，演绎的是战斗的农民成长为革命主体的历史进程。延安时期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这些农民中间成长起来的新人物，表现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壮阔场景。觉醒的赵玉林披露自己的心思，说自己“把命搭上”也要革命到底，个体的成熟意味着农民确立了自身的阶级主体性。党员作家对农民成为历史主人的想象性叙述，颠覆了五四新文学从启蒙视角对农民的书写。与五四新文学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沉默农民形象不同，党员作家笔下的农民则展现了“一旦献身革命，就会不怕牺牲”的信念和果敢，他们是成就革命伟业的先锋。

2. 肯定人民的历史作用。一切依靠群众是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共始终将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作为根本的行动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号召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认为这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保证^{[8]3}。其后，中共不断阐述和强化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这一思想。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一切依靠群众”，高度首肯人民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动员广大党员深入到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党员作家对人民创造历史的思想十分认同，在作品中形象地记录和书写了人民改造社会的伟大历程，歌颂了人民作为革命主体的斗争精神。左联时期，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描写了苦战奋斗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斗争。作家礼赞了农民身上那种“暴风骤雨”般的力量，正面展现了党领导下农民的反抗怒吼，彰显了农民创造新历史的伟力。延安时期，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史诗般的笔触再现了农村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歌颂了登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在建设民族国家时焕发的力量。全书以“斗争”“分地”“参军”为结构框架，形象地图解和演绎了农民发挥自身力量参与革命的过程。那些通过阶级斗争获得政治自由和通过土地

改革获得经济自由的农民,焕发出积极的革命力量,勇敢地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加快了“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可见,党员作家形构的“斗争+解放”叙事范式背后,隐含着他们对人民身上蕴藏的革命能量和历史作用的深刻体认。

3. 采用人民喜爱的艺术形式。推崇文艺大众化是中共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在文化上的体现。中共历来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号召作家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教育和团结群众,并将之作为指导文化工作的原则。左联之后其主要领导认为今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向着群众”实行“文艺大众化”的转向,将文艺大众化作为反帝之外的另一项工作。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讲话》中从创作主体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对文艺大众化的内涵做了规定:作家情感的大众化,即作家与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6]⁸⁵¹;艺术形式的大众化,即采用大众接受和喜爱的形式。这一解读深化了文艺人民性的内涵。党员作家自觉回应党对文艺工作的大众化要求,创作了大量深蕴人民性内涵的文艺佳作。赵树理是代表《讲话》新方向的典范作家,他的《小二黑结婚》典型地体现了文艺大众化的精髓。小说描写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新农民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爱情故事,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从创作主体看,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人民大众心贴心。作为农民的“贴心人”,赵树理知晓他们的思想、生活方式和前途打算^[20]。他笔下人物的所思、所行和所想都贴近农村生活的现实逻辑,是解放区农民生活的真实再现。从艺术形式看,作者将“老百姓喜欢看”作为艺术追求,主动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因子。《小二黑结婚》采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诸多技法,真正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与人民大众的心意相通。

人民性是党员作家创作彰显的又一典型特征,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容随社会发展情势而演变。革命文学时期,文艺人民性得到初步阐发,人民被界定为“民众”,即“新的阶级”,蕴含着底层取向和阶级意识。左联时期,人民性得到深化展开,人民意指“劳苦大众”,隐含着阶级性和革命性。延安时期,人民性得到最终确立,人民被阐述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强调党员作家站在党的立场描写生活,突出了党性和

人民性的统一。可以说,党员作家对人民性内涵的表达与党对革命文艺人民性的探索具有内在一致性。

为了避免对党的左翼的误解,将它和鲁迅左翼进行学理区分是十分必要的。对人民性内涵的理解是界分两者的标尺。在党的左翼的语境中,人民性指向劳苦大众并从阶级本位的角度被等同于“工农兵”,它被表述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主体。如周立波所说,那些坚决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劳动人民。而在鲁迅左翼的语境中,人民性虽也指向劳苦大众却从个人本位的立场被描述为普通人,它被表述为一个被启蒙的弱势群体。如萧红所说的,“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生活中平常“人类的愚昧”^[21]。对人民性理解的差异不只是概念内涵的单纯替换,更是两种价值叙事显现出的思想变迁。党员作家洪灵菲《大海》中塑造的那个农民阿九,被赋予了承担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历史重任。作家站在党派的立场描写社会的阶级对立,赞颂农民身上体现的革命性,唤起大家对这个崇高群体的认同。左翼作家萧红《呼兰河传》中塑造的那些看客形象,其愚昧与野蛮的性格根源于病态国民性的濡染。作家站在启蒙的立场揭示国民性的弱点,批判农民身上麻木的劣根性。这也导致两者在贯彻大众化立场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党的左翼强调归顺大众的融入姿态,叙事空间上接受党的权力规训。鲁迅左翼采取启蒙大众的批判姿态,叙事空间上保持个人的创造激情。

党员作家对人民性的话语实践,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取得的创作实绩,它体现了党员作家自觉建构人民主体这一另类现代性的时代诉求。因此,党员作家的人民性书写,不能完全看成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它还根植于近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的总体性叙事的历史理性和逻辑”^[22]。明乎此,我们才能同情地理解党员作家人民性书写的丰富内涵和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G].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394.

- [2]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9.
- [3] 商金林. 叶圣陶全传：第2卷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192.
- [4] 洪灵菲. 前线 [M]. 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101.
- [5] 马怀强，方维保. 别一种意义上的启蒙修辞：现代“革命文学”的一种观照 [J]. 学术界，2011（3）：143-150.
- [6] 钱理群. 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 [J]. 现代中文学刊，2010（1）：27-34.
- [7] 许纪霖. 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J]. 开放时代，2021（1）：92-113.
- [8]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9] 张炯，编. 丁玲全集：第7卷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65.
- [10] 何其芳. 何其芳文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76.
- [11]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 [12] 许纪霖. 一个民族的精神史 [M].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181.
- [13] 张炯，编. 丁玲全集：第8卷 [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473.
- [14] 庄钟庆，孙立川. 丁玲同志答问录 [J]. 新文学史料，1991（3）：69-77.
- [15] 韦君宜. 思痛录 [M]. 增订纪念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159.
- [1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 王向峰. 论人民性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意义 [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20-26.
- [1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4.
-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435.
- [20] 赵树理. 赵树理文集：第4卷 [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669.
- [21] 萧红. 萧红全集：第4卷 [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460.
- [22] 李祖德. “人民性”与“人民国家”主体想象：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历史考察之一 [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5-11.

On the Cre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riters Group of CPC Member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LUO Weiwen

(School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writers group of CPC member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are the backbon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left-wing literature and red culture, but there is a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on their creation. In order to reasonably evaluate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start of innovative creation mod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cross-sectional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re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group.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constituting the enlightenment writing with revolutionary enlightenment as the spiritual core; shaping a new type of literature with distinctive Party characteristics;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ith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s the core. The research on the cre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riters group of Party members can restore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is group's creation and deepen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is group.

Key words: writers group of CPC members; creation characteristics; revolutionary enlightenment; Party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 character

(责任编辑 冯庆福)